

元杂剧中的 民俗文化研究

彭栓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元
雜
劇

元杂剧中的 民俗文化研究

彭栓红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 / 彭栓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456 - 5

I. ①元… II. ①彭… III. ①元曲—关系—风俗习惯—文化研究—
中国 IV. ①I207.37②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941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75
插 页 2
字 数 369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延保全

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兴起，今又乘文化强国、非遗保护之风而更成为“显学”。融通文史哲的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学术研究的一种趋势。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到黄现璠等人的“三重证据法”，戏曲研究不再局限于文献方面，对戏曲文物、戏曲民俗的研究逐渐成为戏剧戏曲学研究常态。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民俗与杂剧结合的研究逐渐增多。学人的研究视域不再局限于传统戏曲文本，还关注到戏曲文物对于元杂剧研究的重要性。

元代是戏曲、民俗发展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阶段。民俗文化对元杂剧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而元杂剧演出活动本身也是一种民俗文化。此前，元杂剧民俗研究多集中在剧本中的个别民俗事象上，在还原元杂剧演出和曲牌研究上稍显薄弱。对元杂剧民俗事象更多的是挖掘、罗列和考证，对元杂剧整体的民俗事象进行全面归纳总结的成果较少，而民歌、歇后语和说唱等民间文学对元杂剧的影响研究近乎为空白。大元一统，多民族共存，北方狩猎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礼乐文化并存，这是元朝最大的时代特点。因此元杂剧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但是当前元杂剧中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亦相对薄弱。

栓红君的《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既有宏观的审视，又有微观的剖析。该著运用戏剧戏曲学、文艺美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和戏曲考古等学科理论知识深入探讨元杂剧的生成演变规律，弥补了以往忽视元杂剧中民间文学的研究之不足，全面系统地爬梳元杂剧各类民俗文化，为今后从民俗学视角研究元杂剧提供了一些线索、思路和角度。该著还首次对元杂剧所涉及的寺庙神灵、神话传说、岁时节日等分类列

表统计,极具学术价值,对时代社会、历史变迁和民俗变迁对元杂剧的影响亦十分关注,其中不仅注意到杂剧中的民俗遗存现象,而且注意到了元朝“当代”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特别是对元杂剧中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论述分析,资料上较为详尽,见微知著,多有新见,把民族融合、历史政治和民俗文化结合,反映出民族融合对元杂剧创作的内在影响。此前,学术界对元杂剧演出习俗研究较为薄弱,该著还首次探讨杂剧中上厅行首与一人主唱及其民俗关系,并对“妆孤学俊”“抻香弄粉”和“抛髯”等化装表演与竹马表演中蹠、骑、躡、跚竹马等杂剧表演形态做了辨析,具有开拓意识。同时充分考虑剧本、观众、演员、剧场等特点,并结合时代、民族、地域民俗特点,指出元杂剧存在民俗趋同的现象,这既是受民俗文化圈影响的结果,也是杂剧演出吸引观众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洞察到民俗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与元杂剧的关系,层层剖析,既有历史的洞见,又有现实的反思,颇见功力。

《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一书中的元剧资料来源,既有原生态的元刊杂剧,又有后代编选的元曲选,从而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元杂剧实貌。其推理论证资料来源,除了戏剧戏曲学经典之外,还涉及语言、文学、历史、方志、笔记、类书和宗教等文献,也有《女真谱评》一类的民间口头资料,甚至有碑刻、戏台和瓷器等文物,足见其开阔的学术视野。细读此著,很多思路观点常令人耳目一新,在元杂剧研究中具有拓荒性,如论述火炕、钱龙、虾蟆、影神、福气、太岁、五脏神、鸦崇拜和九天女等,此外元杂剧中的三级权力文化网络、传说变迁现象、重述神话和民俗文化圈等思想的提出,都是基于栓红君对民俗知识的积累与思考,这正是戏剧戏曲学单一学科研究所欠缺的。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是其治学之精神。栓红君基于自己多年对山西民歌研究心得,利用山陕民歌资料,以今证古,并从古今民歌的承袭演变、近代戏剧文学的吸纳角度对谭达先论述的元杂剧中的撒帐歌、政治歌的分析观点做了进一步商榷探讨。对郑宾于《孟姜女在〈元曲选〉中的传说》统计数据做了纠正,对钟涛《元杂剧艺术生产论》中元杂剧时代划分做了细化和补充,并附断代依据。栓红君也对学术界杂剧中心说的学术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列表梳理上厅行首及其主唱关系,从人文、地理和民俗的角度探讨了剧本中河南艺人“多”和大都、平阳

艺人“少”的现象及原因。杂剧中心说一般仅仅关注剧作家、戏台的地域分布，而忽略杂剧演员和杂剧所记演出的地域性，栓红君弥补了学界研究这一不足。栓红君若能再深入结合当前文学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研究结果必定会更有兴趣。

孜孜不倦，关注元剧，深入分析。此著是栓红君博士论文的结晶，但也有补充和完善，融入了近年新的思考。如谈及元杂剧中的女真服饰民俗华丽贵重特征时还考虑到宋辽金元织物用金传统、宋元纺织技术的进步和“金以儒亡”的历史观点，论述女真骑马射箭习俗，又考虑到猛安谋克制度，等等，其学术视野进一步拓展。

文艺发展自古有一颠扑不破的规律，即雅俗互补，来自民间鲜活的生活，也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戏曲、民俗都扎根民间，我们的研究不能忽视这一点。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元杂剧”，对戏曲发展史而言，别具风味。以戏曲为研究对象，对民俗学来说也是一块可供探索的宝地。这种研究思路也契合了当下跨学科、跨文化领域的研究热潮，体现出栓红君一定的学术创新力与敏锐触觉。希望该书的出版会引起戏曲研究者与民俗学界的重视与关注，并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次成功试验。

栓红君和我渊源颇深，2002年就师从我攻读民俗学研究生，2005年毕业后回到雁北师范学院（现大同大学）任教。2009年又痴心不改，跟随我攻读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三载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返校。后旋即被任命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主任，2013年晋升副教授，可以说进步非常快。栓红君为人谦逊，踏实稳健，勤奋笃诚。工作任劳任怨，学习心无旁骛，交友肝胆相照，是我认同的为数不多的“真君子”。至真之人在做学问上也显得很“真”，愿意下“笨功夫”，所以往往能有所创获，且时有新见。目前已经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著作多部，四年前被聘任为山西师范大学民俗学硕导，称得上年轻有为。作为他的导师，我备感欣慰。《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研究》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捧读之时，当年师徒一起研磨论文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只是时光匆匆，前路迢迢，唯愿其学术日渐精进而已。

是为序。

丁酉年五月于山西师大蒔英园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元杂剧中的民俗文化分类	(19)
第一节 民间文学部分	(20)
第二节 民俗事象部分	(45)
第二章 民俗变迁对元杂剧创作的影响	(104)
第一节 口头文学传统与元杂剧创作变化：以传说为例	(104)
第二节 民俗信仰变迁与元杂剧文本表现：以神灵信仰为例	(120)
第三章 元杂剧创作中的少数民族文化	(142)
第一节 元杂剧中的女真族民俗文化	(144)
第二节 元杂剧中的蒙古族民俗文化	(162)
第三节 元杂剧中的回族民俗文化及其他	(170)
第四章 元杂剧中的演出民俗	(189)
第一节 演剧行业习俗	(189)
第二节 元杂剧中的化妆习俗与表演	(202)
第三节 元杂剧中的脚色与戏剧表演	(208)
第四节 元杂剧中的砌末与表演习俗	(220)
第五章 元杂剧中民俗运用的动因	(231)
第一节 时代特征及其人文精神的体现	(231)

第二节 元杂剧中底层话语的审美表达	(246)
第三节 元杂剧中的民俗趋同与文化认同	(270)
结 论	(284)
附 录	(287)
附录 A 元杂剧中的寺庙、神灵一览表	(287)
附录 B 元杂剧故事时代一览表	(298)
附录 C 元杂剧神话传说一览表	(315)
附录 D 元杂剧中传统岁时节日一览表	(327)
参考文献	(333)
后 记	(353)

绪 论

一 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从民俗的层面来看，人是一定民俗文化中的人，文艺创作者也不例外，在塑造人物形象、布局谋篇、传情达意等方面，常或隐或显地把民俗文化融入作品中。我们研究元杂剧，无法回避民俗视角，不得不正视民俗文化对元杂剧的影响和元杂剧演出构成民众民俗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客观现实。

从古代文学史编写内容来看，先秦诸子散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现代学者眼中构成了古代文学的主干。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董乃斌、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等都突出了元杂剧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吉川幸次郎认为“在中国的戏剧文学中，元曲是最优秀的”^①，对元杂剧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从戏剧史角度来看，不可否认元杂剧是戏剧发展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王国维更称元杂剧为“真正之戏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第七章“古剧之结构”说：“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而论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②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元杂剧

① [日]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陈顺智、徐少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187页。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叶长海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是“中国最初的戏剧”^①。元杂剧还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戏曲的繁荣、成熟期。董每戡在《中国戏剧简史》中指出：“戏剧之所以到元特盛，不是无因。”^② 廖奔、刘彦君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说：“中国文化在宋金、宋元分治时期，出现奇妙的呈现，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几乎同时产生了戏曲的成熟形式。南方的为南戏，北方的为北杂剧。”^③ 刘荫柏《元代杂剧史·绪言》认为：“元杂剧的出现，它标志着中国的戏曲艺术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故戏曲史家称元代为戏曲的黄金时代。”^④

从民俗发展史看，元代民俗有传承也有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新民俗，很多流传后世的著名的传说故事和民俗事象在此时初露端倪或丰富、定型，文艺创作中民俗的选择必受之影响。从戏曲民俗的视角来看，戏曲的发展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代面》《钵头》、唐参军戏、金院本、元杂剧、明传奇、清地方戏，其轨迹所至，从一开始就具有民间性，常以娱乐为目的，大量底层民众参与。演出时既运用具体的民俗砌末，也在剧本中涉及神话、传说、故事，并渗透各类民俗事象。戏曲与民俗，二者关系密切。民俗文化是戏曲生成的文化生态，戏曲是民俗生活中的戏曲。戏曲与民俗兼有草根性、民间性的特征，戏曲从剧本内容到演出场所都离不开民俗。民俗的地方性、民族性、变异性与稳定性对戏曲的语言、演剧方式、思想内容、戏剧冲突等都产生影响。唐文标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中把戏曲视为民间艺术、平民文化和俗文学。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把戏曲也视为俗文学，杨荫深、段宝林等学者也持此观点。很多民间文学教材把地方小戏或戏曲视为民间说唱文学。朱光荣认为：“民风民俗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优秀剧作是离不开表现民风民俗的。好的民风民俗，是人民精神思想的寄托，把它编进戏曲中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⑤ 郑传寅先生也指出：“面向社会人生、面向大众的古典戏曲与风俗习惯的联系确实是非常密切的，民俗事象的大

① [日]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

② 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102页。

③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第二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④ 刘荫柏：《元代杂剧史·绪言》，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⑤ 朱光荣：《论中国戏曲里俗文学的艺术魅力》，《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量摄入使戏曲染上了浓厚的民俗色彩，其中尤以元人杂剧最为鲜明。”^①廖奔在《中国戏曲史》中说王国维偏爱元杂剧，以为真戏剧，元后无戏剧是没有看到民俗文化与戏曲的关系：“王国维过于偏爱元杂剧，过激地得出明以后无戏曲的结论，这是只注目于戏曲的文学成就而忽视其民俗之俗文化作用所造成的偏颇。”^②可见，戏曲与民俗关系之密切。

从民族史的角度看，北魏是由统一我国北方的鲜卑族建立的国家，而元王朝是由统一全中国并开疆拓土的蒙古族建立国家的。元朝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元杂剧在这样一个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孕育成熟，其所承载的丰富的多元民族文化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信息是极具研究价值的。

因此，基于文学史、戏曲史、民族史和民俗学的视野来观照元杂剧是本选题的初衷。本选题以元杂剧研究为突破点，把民俗、民族与戏曲关系做一个理性探讨，试图寻找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尽可能从戏曲史和民俗史、民族史、文学史的角度予以全面关注元杂剧的生成与演变规律。元杂剧研究一直是戏曲研究的重点，成果众多，但是如何能真实地反映元杂剧的创作、演剧与民俗的关系，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二 元杂剧民俗研究文献综述

王国维从史的角度研究元杂剧，1913年《宋元戏曲史》完稿。王国维是人们公认的开创20世纪中国戏剧史研究的第一人。元杂剧的研究从早期戏曲史、考证研究以及对作家作品、人物、语言的具体化研究，到借用文化学、叙事学、民俗学、音乐学、主题学等理论多角度研究，成果丰硕。而以民俗学视野观照元杂剧研究，则起步相对较晚。笔者就近百年元杂剧民俗研究略做梳理。

（一）20世纪元杂剧民俗研究现状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人们思想观念造成很大冲击，中国的文人学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灵感，激发乡土意识，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

① 郑传寅：《民俗与戏曲的俗文化品格》，《戏曲研究》第62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② 廖奔：《中国戏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在反思文学、文化的过程中，也给戏曲研究带来新曙光。20世纪30年代，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为代表的著作把元代散曲归为俗文学，开创了后世把戏曲归为俗文学的先河，一定意义上也拉近了戏曲与民俗的距离^①。40年代，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1948）按笔画编排方言顺序，对金元戏曲方言所做的考释，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戏曲内容，而方言的研究视角，说明徐嘉瑞注意到了金元戏曲的民间性特点。这种研究思路对顾学颉和王学奇合撰的《元曲释词》（1988）、方龄贵的《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2001）等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五六十年代中国戏曲的发展受时代影响，讨论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对元杂剧也有影响，如阿英的《元人杂剧史》中人民性的范畴多少与民俗学者的底层意识接近。叶德均的《戏曲小说丛考》（1979）从俗语角度考证元杂剧常用的“赵老送灯台”是宋元相沿袭的谚语^②。80年代前，学者们真正以民俗学学科的视角研究元杂剧的几乎没有，而且戏曲研究专家关于元杂剧民俗方面的研究鲜见。少数学者虽有一种乡土意识，以民间立场从方言俗语等角度触及元杂剧，但民俗视野略偏狭。

改革开放后，国人视野得到了开阔。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让世界再次瞩目东方文化，再加上国际寻根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学者文化反思并融入文化寻根的世界潮流中，在钟敬文等前辈的号召下民俗学发展走上快车道。随着民俗研究热的兴起，元杂剧与民俗相结合的研究也渐为人们所重视。以台湾学者颜天佑的《元杂剧的平民意识》和澳籍华人谭达先的《民间文学与元杂剧》为代表，谭达先的《民间文学与元杂剧》（原名为《民间文学与元杂剧之关系》，是1989年香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在1994年出版时更名为《民间文学与元杂剧》）依据《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梳理了元杂剧从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四个方面吸取、活用仿作情况，在方法上多用母题分类法^③。笔者以为谭达先是有意识地以民俗学的眼光，从民间文学视野综合研究元杂剧的第一人。大陆学者80年代末出现了以《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②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3—414页。

③ 谭达先：《民间文学与元杂剧》，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版。

(1987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和《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1989年廖奔编著)研究戏曲(当然包括元杂剧)的新思路。而戏曲文物的视角必然考虑民俗文化背景,廖奔的《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有意识地从民俗角度阐释民俗文化对戏曲的影响,但全书论述基于戏曲本位思想,元杂剧民俗方面的论述相对较少。翁敏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能长期坚持从事戏曲民俗研究的学者,这一时期代表性论文有《戏曲曲牌与宋元民俗》(《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而注意到元杂剧中少数民族题材的学者如车锡伦、袁爱国的《浅论女真族剧作家李直夫的杂剧〈虎头牌〉》(《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李勤西的《元代女真人杂剧〈虎头牌〉略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等,仅仅限于从文学角度解读其结构、冲突、人物、主题等,缺乏明显的民俗研究意识。

总之,20世纪80年代是元杂剧与民俗结合研究的发轫期,研究人数少,成果也少。可喜的是学界已经注意到了民俗对于杂剧研究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杂剧剧本选择主要是《元曲选》《元曲选外编》,主要是明刊杂剧,尽管发现了《元刊杂剧三十种》,但对其研究多集中在校勘方面。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和民俗学在中国80年代处于学科探索阶段有关。

90年代,我国南方学者的戏曲民俗研究成果较多,以康保成、翁敏华、吴国钦等为代表的知名学者从民俗的角度研究元杂剧。方法上,以元杂剧中的民俗事象为切入点,或溯源考述或分析其文化内涵。研究对象或进行剧本研究,针对剧本选“点”研究,关注一剧中的某一类、某一个民俗事象;或选面研究,挖掘元杂剧、宋元戏曲剧本中的时代民俗文化内涵;或进行作家研究,分析某位作家或作家群的杂剧中民俗文化渗透现象。这一时期代表性成果有:康保成的《元杂剧呼妻为“大嫂”与兄弟共妻古俗》(《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翁敏华的《宋元市井风俗与元杂剧〈魔合罗〉》(《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论〈桃花女〉杂剧及其蕴含的“桃木辟邪”意象》(《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杂剧〈百花亭〉与宋元市商民俗》(《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宋元戏剧伎艺人名号考论》(《中国民间文化》1992年第6集);吴国钦的《关汉卿杂剧中的民俗文化遗存》(《戏剧艺术》1999年第3

期)等。值得一提的是叶蓓的《浅析蒙古民族文化对元杂剧形成及发展的影响》不像以往用文学的方法分析杂剧,而是试图探索少数民族文化对元杂剧形成发展的戏剧史规律,涉及蒙古族音乐、语言这类民族民俗文化对元杂剧的影响^①。这一时期的著作以郭英德的《元杂剧与元代社会》(1996)和幺书仪的《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1997)为代表,著述中部分章节涉及元代民俗文化。

(二) 21 世纪元杂剧民俗研究现状

21 世纪戏曲民俗研究有了群体自觉的趋势。一是对戏曲中的民俗事象的研究更细致更系统;二是意识到宏观地研究戏曲与民俗关系的重要性;三是方法上呈现积极探索的趋势。

刘桢在《戏曲与民俗文化论》中呼吁戏曲研究的民间立场,提倡回归民间^②。戴峰在《戏曲与民俗的互动研究》中指出:“着力挖掘戏曲与民俗的‘关系’,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③此外还有解玉峰的《民俗学对中国戏剧研究的意义与局限》(《学术研究》2007 年第 9 期)。这种明确的戏曲民俗学理探讨,进一步推动了元杂剧民俗研究的深入发展。元杂剧民俗研究在宏观与微观研究上都有了突破。元杂剧民俗研究也趋向细化,如对衣食、婚丧、鬼魂等具体民俗事象的分析,如周玲的《元杂剧中的米食文化习俗》(《贵州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孙利平的《元杂剧中的婚俗文化遗存》(《戏曲艺术》2001 年第 4 期)、罗斯宁的《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中山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吴晟的《宋元戏曲中民俗事象摘要》(《广州大学学报》2005 年第 8 期)、袁燕军的《浅谈论元杂剧的婚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6 期)等。有从杂剧的唱曲及舞台科白等角度挖掘民俗对演剧的渗透,如以张连举的《论元杂剧唱曲及戏台动作中的民俗事象》(《求索》2005 年第 11 期)、《论元杂剧宾白中所表现的民俗事象》(《贵州大学学报》2009 年第 4 期),还有康保成的《酒令与元曲的传播》(《文艺研究》

① 叶蓓:《浅析蒙古民族文化对元杂剧形成及发展的影响》,《民族文学研究》1997 年第 4 期。

② 刘桢:《戏曲与民俗文化论》,《戏曲研究》第 70 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③ 戴峰:《戏曲与民俗的互动研究》,《文艺报》2005 年 9 月 8 日第 007 版“理论建设”栏目。

2005年第8期)等为代表。有从某一作家、作品角度归纳民俗事象,分析其文化内涵和结构特点的,如李玲珑的《论元代四大爱情剧情节程序的民俗文化特点》(《艺术百家》2006年第7期)等。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能稳定地专注于元杂剧民俗研究的学者,如康保成、翁敏华、王政等。王政从民俗角度侧重研究戏曲母题,近年发表的诸多论文也多与元杂剧有关,如《元杂剧〈秋胡戏妻〉古俗考》(《戏曲研究》2002年第60辑)、《元剧中的祈雨古俗略考》(《中国戏剧》2007年第12期)、《元代戏曲中的拜月古俗考》(《戏曲研究》2008年第75辑)等。其中《元明戏曲中的墓祭古俗考》(《民族艺术》2009年第3期)对于元明戏曲中蕴含的墓祭民俗事象进行了剖析,认为戏曲中的民俗事象影响了戏曲母题和审美特征,提出建立戏曲民俗学的思想^①。《元明戏曲中的“抛绣球”事象略考》(《名作欣赏》2011年第17期)一文指出:元明剧作婚事中的抛绣球,有入赘婚古俗的痕迹,常与接丝鞭结合描写,闺中女子有一定择偶自主权,是一种较为灵活的文化“撮婚”形式,抛绣球择偶母题有文学史的背景意义^②。

有从说唱文学等角度研究元杂剧的,如徐大军的《元杂剧演述体制中的说书人叙述质素》(《戏剧艺术》2002年第6期)、朱恒夫的《〈窦娥宝卷〉与北杂剧〈窦娥冤〉之比较》(《戏曲研究》2003年第63辑)、罗斯宁的《元杂剧在元代的口头传播》(《戏剧艺术》2005年第6期)、任会平的《论宋代说唱艺术对杂剧形成之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还有从戏曲文物方面关注元杂剧的。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传承80年代的传统,彰显着自己的本色,常用戏曲文物与元杂剧文本互证的研究方法,近年代表性论文如《戏剧艺术》2011年第1期发表的延保全的《宋金元戏曲化妆考略》和车文明的《中国古代戏台规制与传统戏曲演出规模》,从戏曲文物的角度论及元杂剧演剧特点。涉及元杂剧的著作有车文明、王福才、延保全编写的《平阳宋金元戏曲文物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黄竹三、延保全合著的《中国戏曲文物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其中《中国戏曲文物

① 王政:《元明戏曲中的墓祭古俗考》,《民族艺术》2009年第3期。

② 王政:《元明戏曲中的“抛绣球”事象略考》,《名作欣赏》2011年第17期。

通论》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戏曲文物的学术专著。对戏曲孕育、形成、繁盛不同时期的各类文物做了详细介绍,对戏曲文物中展现的演出场所、脚色行当、服饰化妆、砌末乐器等都予以专章考述^①。还有学者从民俗与民族关系角度,认识到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对戏剧创作内容和杂剧形成的影响。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翁敏华的《〈秋胡戏妻〉杂剧与“桑林淫奔”古俗》认为《秋胡戏妻》是远古“桑林淫奔”习俗与中古“陌上桑”拒婚传说的双重叠合,既有少数民族自由开放的婚恋观,又有回归礼教的雅文化诉求^②。此外还有李成的《金代女真文化对元杂剧繁荣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1期)、宋德金的《元杂剧中的金朝和女真人》(《文史知识》2010年第9期)、郭小转、胡海燕的《从蒙古族习俗及文化心理看元杂剧大团圆结局》(《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高红梅的《蒙古民俗文化对元杂剧的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从民族融合角度关注元杂剧民俗现象的有戴峰的《民俗融合与元代宗教戏剧的世俗化》(《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和李义海的《民族融合在古代戏剧中的表现——元杂剧中的婚姻习俗》(《戏剧文学》2009年第12期)等论文为代表。

2005年以来,高校博硕士学位论文从民俗角度研究元杂剧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代表性成果是2005年中山大学周玲的博士学位论文《元杂剧民俗文化遗产研究》,该论文对元杂剧中的服饰、饮食、行旅、市商、婚俗、游戏、节日等民俗事象细化研究,认为元杂剧中民俗具有民族性(汉蒙)、乡土性(中外)、历史感(古今)、两重性(雅俗)特点,有助于深化作品主题,营造故事氛围,推进故事发展,丰富人物形象,深化人物性格,加强生活环境的典型性,以及对元杂剧题材风格的影响^③。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2011年公开检索到的相关硕士学位论文有9篇左右:武虹芊的《论民俗在元杂剧中的分布及其作用》(2006年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晓兰的《宋代伎艺及其对元杂剧的影响》

① 黄竹三、延保全:《中国戏曲文物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② 翁敏华:《〈秋胡戏妻〉杂剧与“桑林淫奔”古俗》,《中华戏曲》第26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周玲:《元杂剧民俗文化遗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05年。

(2006年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王燕的《元杂剧与元代时尚风俗研究》(2007年广西师大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张鹏宇的《元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2007年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静雅的《元杂剧的民俗文化研究》(2007年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邸允峰的《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元杂剧鬼魂戏研究》(2008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袁燕军的《元杂剧民俗浅析》(2009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叶利伟的《元散曲中的民俗文化研究》(2011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近年硕士学位论文大多数都是对元杂剧中民俗事象的分类罗列,内容大同小异。而王燕、张晓兰和邸允峰的硕士学位论文稍有新意。王燕的《元杂剧与元代时尚风俗研究》认为:首先,时尚风俗选择元杂剧这一文体作为载体,体现了俗文学潮流的走向,促进了杂剧文体的成熟;其次,时尚风俗也使得元杂剧内容具有当下的意义,容易为观众接受;再次,时尚风俗奠定元杂剧俚俗的基调;另外,时尚风俗有利于扩大杂剧观众面;最后,少数民族文化因子的时尚风俗的介入,背叛了传统雅文学的审美观念,张扬了元杂剧的个性魅力^①。张晓兰在《宋代伎艺及其对元杂剧的影响》一文中把宋金伎艺分为乐舞、说唱、泛戏剧和百戏四大类,探讨其对元杂剧的影响。邸允峰从文艺民俗学角度研究鬼魂戏,运用心意民俗相关理论,对驱鬼辟邪、岁时节令、复仇习俗等对鬼魂戏的熔铸做了分析^②。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中林家如的《元杂剧中的民俗与民俗活动》论文通过阅读162本元杂剧,从元杂剧的婚丧喜庆、游戏技艺与节日、宗教信仰等民俗方面,表达圆满和谐的婚姻观、慎终追远的丧葬观、农村稳定生活的追求。进而指出元杂剧剧本中所包含的民俗与民俗活动大多是古代就存在的,一直流传至元朝的事实,但再未深入探讨。可喜的是该论文对两岸元杂剧研究概况作了较为详尽的综述^③。

近年从民俗角度研究元杂剧的专著以2007年罗斯宁的《元杂剧和元代民俗文化》一书为代表,从元杂剧的传播、审美、题材、艺术、人物、

① 王燕:《元杂剧与元代时尚风俗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

② 张晓兰:《宋代伎艺及其对元杂剧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6年。

③ 林家如:《元杂剧中的民俗与民俗活动》,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东吴大学,2009年。